

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进路 ——以中国与马来西亚为例

邢晶、何启才

摘要: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旨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共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的运作逻辑。中国与马来西亚隔海相望传统友谊深厚,“一带一路”的提出推动中马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然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对中马两国民心相通造成深远影响。本文以中国与马来西亚公共外交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从学理视角重构公共外交的模式框架,从实践维度重塑公共外交的传播路径,在后疫情时代重新构建以公关外交为主导,媒体外交为中坚,人文外交为主力,侨务外交为纽带的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进路,为中马命运共同体贡献更有实践意义和价值内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公共外交; 后疫情时代

作者: 邢晶, 文学院副教授,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邮箱: xingjing@bttc.edu.cn; 何启才,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研究兴趣是海外华人研究。邮箱: hkeechye@um.edu.my。

Title: Public Diplomacy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The Case of China and Malaysia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tensively elaborated 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s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framework of public diplomacy.

Despite the longstanding history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and the positive cultural exchanges encourag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unrest and the recent epidemic have severely impacted these connec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define the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cusing on Sino-Malaysian public diplomac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n order to provide Chinese wisdom and strategies to the China-Malaysi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new public diplomacy approach, emphasizing political diplomacy as the cornerstone, media diplomacy as the backbone, cultural diplomacy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overseas diplomacy as the connecting link.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ublic Diplomacy, Post-epidemic Era

Author: Xing J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i Malay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Email: xingjing@bttc.edu.cn; Ho Kee Chye, Senior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i Malay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Email: hkeechye@um.edu.my.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引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由之路。

2023年3月，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多次强调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与马来西亚“昌明大马”的理念高度契合。人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格局、国际秩序、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健康造成未有冲击，无形中将人类历史进程重新划分为新冠疫情前（Before Corona）和后疫情时代（After Corona）²。新冠疫情暴发加剧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沉渣泛起，使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中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将为马来西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马来西亚作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中马双边关系一直以来基础深厚，经贸、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2023年迎来双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2024年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重新定义中马公共外交的内涵，重新塑造公共外交范式，重新梳理公共外交路径，使公共外交成为助力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发展助力民心相通的现实进路。

尽管中马学术界一直基于两国公共外交的现实关切，尝试以西方公共外交理论框架为参照，构建基于中马国情的本土化话语体系，探索广受认可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因此本文将探讨如何应对潜在风险拓展中马人文交流的活动空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语境下提升中国软实力，从本土研究策略重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中马公共外交的衍生逻辑、现实挑战、行为模式以及优化路径。

一、理论溯源：中马公共外交的衍生逻辑

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软实力提升逐渐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显性指标。“软实力”一词源于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是“国际关系中除军事、经济以外的第三种实力，包括

2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疫情是“新冠肺炎疫情前（B.C.: Before Corona）世界”和“新冠肺炎疫情后（A.C.: After Corona）世界”的历史分界点。

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³”。进入新世纪，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公共外交已经由独白式的单向宣传转向全民共情互动对话，这种转变体现出新型公共外交的对话性、协作性与兼容性。换言之，行之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动能够实现人文领域的交融契合，促进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助，最大程度实现国家间利益认同。

（一）中国式公共外交的理论演进

在国际政治与传播研究领域，“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专业术语最早是由 Edmund Gullion 在 1965 年提出⁴，泛指一国政府对目标国公众的外交行为。随后一系列外交术语衍生而出，如“合作外交、竞争外交、非政府组织外交、移民外交、政党外交、品牌外交、商务外交”⁵。目前学界达成普遍共识，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实践经历了由传统形态向新兴模式的转型，“新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时代已经到来。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 Nicholas J. Cull 认为相较于传统公共外交形式，新公共外交更加强调非政府和非国家因素的主动参与，公众在公共外交中的主客体地位相互置换⁶，而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使更多民众参与到数字化公共外交成为可能。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对外战略目标在公共外交的理念与做法各不相同，如美国的“战略外交模式”，英国的“多层化外交模式”，日本的“商业化外交模式”，以色列的“族裔外交模式”，以及中东国家的“宗教外交模式”⁷。

近年来，中国学者重新对以“人民外交”为主要模式的公共外交内涵、作用、条件进行本土化解释。所谓中国式公共外交，可以理解为“国家为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

3 Nye,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13.

4 Gullion, E: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p.4-21.

5 Leonard, M. & Stead, C. & Smewing, C: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p.115.

6 Nicholas, J.C: *Public Diplomacy, Lessons from the Past*,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 2009, pp.34-56.

7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23页。

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⁸。由此可见,中国式公共外交逐渐从国家事务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别于传统外交形式是少数人对少数人的官方行为,更多倚重领导人与外交官的能力,中国式公共外交则是以“政府为主导,公众作为主体,媒体是关键,精英是中坚”⁹,借助国际传播、公关、援助等手段,以影响外部公众态度,进而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

(二) 中马公共外交的话语体系构建

近年来很多国家在重视跨国企业、国际传媒、学术智库等非政府行为体作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外侨资源¹⁰,国际移民群体逐渐成为国家对外交往中倚重的资源。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随着海外华人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华人资源为载体的中国公共外交实践逐渐成为推进民心相通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抓手¹¹。中国作为侨务资源大国,“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首次于2011年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提出,是全球化背景下“外交公众化与侨务外交化融汇的产物”¹²,其理论内涵与行为动机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在公共外交对外传播时,难以将“普通民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全部纳入传播范畴,于是“精英效果理论”为外交实践指明了方向,即重点面向精英群体,通过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的影响力带动普通民众产生“跟随效应”¹³。换言之,华人华侨不仅作为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同时也

8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页。

9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第9页。

10 朱奕龙:《加强研究,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第1期,第43-45页。

11 刘泽彭、陈奕平:《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12 赵可金、刘思如:《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兴起》,《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5期,第15页。

13 林逢春:《马来西亚华人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与制约因素》,《亚非纵横》,2014年第2期,第86页。

是公共外交的传播客体。然而以侨为桥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发挥华人华侨在公共外交中的桥梁作用能够营造国际舆论环境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将众多海外华人纳入公共外交队伍赋予外交职能，可能会产生国家间的外交问题¹⁴。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马来西亚华人角色置于中马关系框架下显得尤为重要。生活在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国家之中，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以来为维护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作出不懈努力，使马来西亚成为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外保留最完整华文教育体系以及中华文化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因双边互利需求使其成为中马经济合作的桥梁，又因对中华文化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使其扮演了中马文化交流使者¹⁵。作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即华人社团、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在中马公共外交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结合特定国别语境解析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内涵，中国对马来西亚公共外交可以表述为：以公关外交为主导，媒体外交为中坚，人文外交为主力，侨务外交为纽带，以增进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形象认知，提升中国软实力在马来西亚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活动。

二、局面反思：中马公共外交的现实挑战

当前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外溢产生负面效应，严重削弱了全球治理水平，深刻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中列出中国快速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沿线所经国家存在较大政治不确定性、能否得到相关国家的思想认同、既得利益国家冲突、国际舆论的误读与曲解、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威胁等，都将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制

14 Suryadinata, Leo: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2017, pp.113-122.

15 胡春艳：《“一带一路”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与中马文化交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9-31页；陈奕平：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4-112页；

约因素¹⁶。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对中国形象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民众对待中国影响力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¹⁷，因此中国与马来西亚公共外交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值得反思。

（一）政局动荡与疫情交迭的不确定性

马来西亚新冠疫情始于2020年1月25日，随后每日确诊人数呈个位增长并最终定格在22人，疫情始终处于可控范围。然而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关键节点，“二月危机”¹⁸导致政权争斗与疫情防控顾此失彼，大城堡清真寺万人伊斯兰传教士集会活动成最大感染源，加速马来西亚进入新一波疫情。尽管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严格的防疫政策努力压平病例曲线，然而病毒的持续变异导致日增确诊病例一度高达三万以上。随着确诊人数的迅猛增长，马来西亚一度成为东南亚疫情最严重国家。与马来西亚疫情交织叠加的是政治纷争加剧了政局的不确定性。自2018年“509”大选以来，2020年“喜来登政变”、2021年依斯迈沙比利接任慕尤丁成功拜相，直至2022年第十五届大选中希盟主席安华胜出，使得马来西亚政坛屡掀动荡。各政党间博弈日趋复杂，暗示马来至上主义为核心的种族主义的进一步强化，本质上是马来西亚逆民主化趋势的延续。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呈现出下降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也在越来越多国家遭到质疑。在“一带一路”五通建设中，相较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硬件设施，“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软件配套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与认可，若缺少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则无异于“纸上谈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认同、经济竞争、领海岛礁”的博弈以及西方舆论涉华议程渲染下的“中国债务陷阱”（Chinese Debt Trap），使舆论纠偏释疑解惑或成当务之急。当今，马来西亚在外交领域选择大国平衡的对冲战略，而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马双边发展对

16 人民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文）”，<http://ydyf.people.com.cn/n1/2017/0425/c411837-29235511.html>

17 席金瑞：《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民意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第153页。

18 马来西亚政坛的“二月危机”，又称“二月政变”、“喜来登政变”。2020年2月前任首相马哈迪辞去职务，慕尤丁获选为新任首相。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具有引领作用。由于政局动荡与疫情交迭加剧了马来西亚国家的不确定性，导致中马公共外交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值得商榷。马来西亚社会对“一带一路”接受度取决于三个先决条件，第一马来西亚长期以来马来优先的族群政治，第二是州政府与联邦当局的共同愿景，第三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地缘政治的利益推进。现实情况是，尽管马来西亚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然而民众对于可能产生的债务条款和主权让渡仍存有顾虑¹⁹。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因称对方为“我的大哥”引发在野党抨击，被批有辱国格。因此，如何通过公共外交与马来西亚寻求更多务实合作，有效保障双边关系平稳发展，在平等对话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增信释疑消除偏见，实现合作共赢的利益最大化，实现更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与民心相通，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新冠疫情对民心相通的破坏性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全球治理困境，对国际关系、民间交往产生深刻影响，疫情的冲击引发社会信任撕裂加剧人际关系疏离，为民心相通带来严峻考验。马来西亚学者安焕然在其个人社交账号写到“由于中国疫情暴发于武汉封城之际引发各国人民‘退避三舍’的恐慌，也让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成果受到挑战”。根据2022年3月马来西亚独立民调机构Merdeka Center与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合作展开的民调数据显示，39%的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偏高，12%持负面态度，其余45%则保持中立。值得强调的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对中国好感度指数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19 沈大伟：《中国在当代东南亚的角色》，《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33-35页。

表 1：马来西亚民众对华好感度

	Favourable	Neutral	Unfavourable
Total	39%	45%	12%
Malay	28%	50%	17%
Chinese	67%	29%	3%
Indian	27%	47%	23%
Muslim Bumiputra	33%	54%	6%
Non-Muslim Bumiputra	32%	61%	6%

资料来源：Merdeka Center

在全球共同战疫的关键时刻，一场由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病毒溯源论”试图甩锅中国，捏造中国政府通过“口罩外交”“疫苗外交”影响他国的论调歪曲中国政策。由于东南亚是全球华侨华人最为集中的地区，疫情造成的恐慌与歧视令当地华侨华人处境艰难。“新型黄祸论”“中国异化论”构陷的种族主义话语死灰复燃，海外华人遭遇“恐华症”事件（Sinophobia）激增²⁰。虽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抗疫的努力释放善意，但也夹杂着异样声音。疫情初期，马来西亚中文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部分高校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强制返马中国学生集中隔离遭学生抵制；当地网红发布视频嘲笑中国留学生疫情期间防护过度；中国社交媒体充斥对“马来巫师‘施法’手抓病毒”行为的调侃讥讽；马来西亚全国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停止使用科兴疫苗；中国产新冠自检试剂盒因未遵守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MDA）的批准条件被取消注册。诸如此类的争议性话题充斥网络空间，大量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言论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煽动负面仇恨加深误解偏见，长此以往陷入“塔西佗陷阱”²¹，官方叙事下的国家认知很容易被民间个体言行所消解。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相对弱势以及硬软件不足展露无遗，中国与马来西亚在民心相通建设仍面临诸多现

20 Sylvia Ang & Val Colic-Peisker: Sinophobia in the Asian Century: race, Nation and Othering in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4), 2022, pp.718-737.

21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指政府形象认知如果丧失公信力，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实挑战值得反思。

（三）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认知的复杂性

中国的日益崛起为海外华人社会带来深刻变革，东南亚华人被所在国政权或主流社会压抑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得以重新释放，折射出中国强大的辐射效应，随之出现了“再华化”（Resinicization）的趋势。关于海外华人与中国崛起相关研究，大部分华人学者聚焦于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中国软实力资源、原乡文化祖籍地认同等领域。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将华人群体视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可或缺的载体，却缺少对海外华人的代际差异、华人社会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地区文化特点的考量²²。

长期以来在日益深化的中马关系中，马来西亚华人一直被视为架起双边经济合作的桥梁，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向友族发扬中华文化的传播者。面对马来西亚内政动荡与中国的崛起，长期处于马来优先的多元族群政策下的马来西亚华人将政治认同的挫败投射在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中寻求慰藉。然而在西方媒体不实信息、情感煽动以及信息茧房的侵扰下，华人群体可能出现对中国影响力的认知偏差与心理隔阂。意识形态的鸿沟以及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年轻一代的渗透，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态度²³。于是在虚拟网络空间形成了“中华胶”“马来糕”“慕洋犬”的标签对立。根据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形象认知调查，在文化、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认知度较高，而政治和公民形象方面的认知度较低。甚至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整体形象评价低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华裔。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对南海等涉及两国核心关切的无能为力，其政治及社会影响力受到种族意识的干扰以及马华社会长期出现的分裂等问题，是导致“认识中国、认同中国、认可中国”程度参差不齐的主因²⁴。因此中国在软实力建设对海外华人寄

22 吴益婷、蔡晓玲：《后现代精神与文化符号：马来西亚华裔青年的原乡重构》，《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5期，第76-77页。

23 吴益婷：《中国因素，认同变动与大马华人》，《当代评论》，网址：<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07/19/1-190>，取用日期：2020年10月4日。

24 陈奕平、宋敏锋：《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04期，第64页；胡春艳：《马来西亚华裔新

予厚望的同时，不可忽视文化流动与民族国家政治边界间的张力，如在多元族群建构的国家内部可能诱发族群关系紧张，使华人陷入两难境地。中国在开展积极的侨务外交时可能会危及海外华人的利益，中马双边关系曾出现因中国驻马大使与当地华人团体交流频密被指涉嫌干涉他国内政，引发主流社会猜忌的尴尬局面。因此，中国政府在充分发挥华人桥梁作用的同时，也要维护其作为他国公民的基本权益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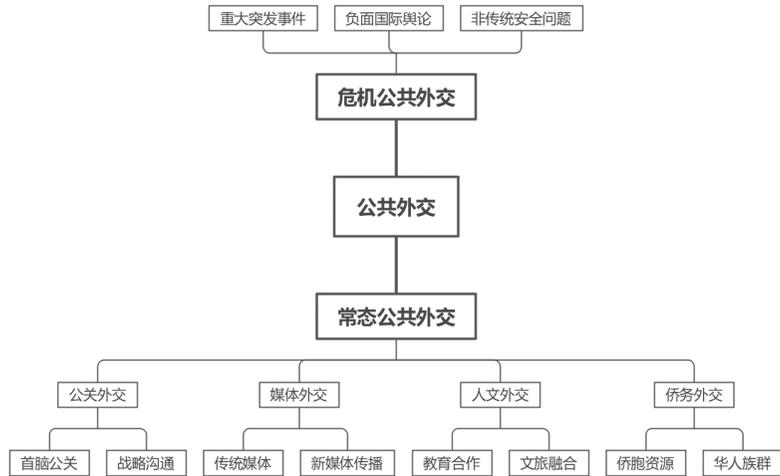
三、现实意涵：中马公共外交的实践模式

公共外交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建设，是新形势下完善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外交工作的开拓方向。经济发展见证中国崛起，“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得到了东盟各国积极响应，对持续深化政治互信，升级经贸关系，推进人文交流具有现实意义。结合特定历史背景与国际语境，新时期中国对马来西亚公共外交的实践模式可以总结为常态公共外交与危机公关外交并存。一方面，在常态化领域开展以公关外交为主导，媒体外交为中坚，人文外交为主力，侨务外交为纽带的公共外交活动，充分发挥跨国企业、学术智库、海外华人华侨等非政府行为体作用，以增进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形象认知，寻求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提升中国软实力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面对重大突发事件、负面国际舆论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政府主体实施危机公共外交的风险管控与危机沟通，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议题以及随之引发的次生危机。

生代对中国的认知——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75页；高伟浓：《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民间桥梁：东南亚国家对华友好协会中的华人角色分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64页。

25 王冠兴、柯世池：《人才环流与华侨华——刘宏教授访谈录》，《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第148页。

图 1: 中马公共外交实践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制图

(一) 人文交流是常态公共外交的内在驱动

根据常态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以政府为主的公关外交、以大众传媒机构为主的媒体外交，以教育文化部门为主的人文外交，以侨务部门为主的侨务外交。

其一，公关外交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不能脱离主权国家公共外交的运行轨迹。近年来，各国政府日益重视通过领导人对外出访开展多元交流展现国家形象，使首脑公关与战略沟通成为公关外交的重要组成。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作为疫情以来首位出访马来西亚的外长，就中马两国关心问题与马方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进一步全面提升中马战略伙伴关系。其二，媒介全球化时代媒体外交成为国家间外交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耦合产物。当新冠病毒引爆舆论生态，信息疫情背后是国家间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握对外传播信息脉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成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²⁶。中国与马来西亚主流媒体探索多业态合作

26 央广网：“习近平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网址：http://china.cnr.cn/news/20160220/t20160220_521420357.shtml，取用日期：2022年10月24日。

模式，建立新闻事件日常互动与联合策划机制，为信息实时共享搭建平台，彼此交换立场和角度，改变西方媒体信息渠道垄断和话语霸权的现状，提升全球话语权。其三，中马两国建交以来在文化、旅游、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展了形式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以中国驻马大使馆新闻与公共外交处、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马来西亚孔子学院、中国厦门大学开设马来西亚分校等机构为代表的人文外交主体在人文交流中担负使命。受疫情影响，各国封锁边界传统旅游停摆，人员跨境流动受阻，中马两国旅游产业严重受挫。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携手中国旅游机构以南洋美食作为文化载体推出“2020马来西亚线上美食节”。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化身旅行推介官，通过VR导览在社交平台推出“VR游中国”栏目，云赏故宫雪景，云游万里长城，让马来西亚民众如身临其境般欣赏中国美景，彰显中国文化温度与智慧。其四，中国与马来西亚侨务外交的相关议题多集中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中国梦”构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作为侨务外交的“资源优势、传播优势、融入优势和长久优势”²⁷，推动中国软实力内向性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观念文化渠道、华社“三宝”、华人精英，还包括中国涉侨部门²⁸。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践行“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面向马来西亚华团华社招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国侨务部门开展系列特色品牌活动，如“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演出、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华文学校教师培训等。疫情中面对美国政客对中国污名诋毁，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刊发署名文章《栽赃中国，可痛、可悲》予以舆论反击²⁹；马来西亚华人精英自发录制《为武汉发声》音乐视频声援中国抗疫。

（二）疫情援助是危机公共外交的标准范式

爆发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中马两国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重构了中马危机公共外交的标准范式。在抗击疫情中，

27 张梅：《中国侨务公共外交：问题与展望》，《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58页。

28 刘泽彭、陈奕平：《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29 张翼卿：《栽赃中国，可痛、可悲》，《星洲日报》言路版，2020年5月12日。

中马两国始终保持密切沟通相互支援。武汉疫情初期，作为全球橡胶手套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马来西亚政府举全国之力调用1800万只医用橡胶手套以解中国医疗物资短缺之困。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马中友好协会、马来西亚民间救援组织“希望行动”等社会团体筹募医疗物资援助武汉抗击疫情。当疫情肆虐全球，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马来西亚卫生部捐助医疗用品，中国驻马大使馆全力打通物资供应链，以便马方能够从中国市场采购急需物品。中马政府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疫苗合作新亮点，签订《疫苗开发和可及性合作协议》，将马来西亚疫苗本土生产纳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健康丝绸之路”合作中，携手应对“疫苗保护主义”弥合免疫鸿沟。中国与东盟在10+1框架下凝聚共识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诊疗方案、防控方案。中国派遣医疗专家组奔赴吉隆坡、雪兰莪、沙捞越和沙巴，通过视频会议、在线问诊、接受采访等方式同马来西亚各界深入交流，答疑解惑。不仅如此，中马友好城市、中资企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向马来西亚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马来西亚中国留学生发表的《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中马合作抗疫记》《Hubungan China-Malaysia dalam Era Pandemi COVID-19》中文与马来文双语文章刊载于马来西亚主流媒体，用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中马合作抗疫故事。“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Bukit Sama Didaki, Lurah Sama Dituruni）成为中马共克时艰的真实写照。

四、实践升维：中马公共外交的优化路径

中国式公共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世界主义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³⁰。尽管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落地，中国与马来西亚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助力亚洲经济走出至暗时刻。中国和马来西亚开展国际合作要摆脱思维视野的局限性，不应只聚焦经贸领域，更应该关注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以公共外交为核心的人文交流

30 史安斌、童桐：《全球危机与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第28-31页。

也应成为主要议题。在后疫情时代，建议中马两国共同应对潜在风险，推进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通过扩展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公共外交路径优化，探索“基于华社并超越华社”的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格局，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奠定民意基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一）公关外交：重塑各领域协同联动新格局

新时期，推动建立中国与马来西亚公共外交新格局，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中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强化双边经济和文化合作交流、增进马来西亚民众对华形象认知，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建立新型公共外交格局要挖掘和扩大两国利益共同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马两国共享繁荣与发展。首先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两国政府启动中马合作高级别委员会，从国家顶层设计密切战略沟通，深化政治互信，为后疫情时代重塑公共外交范式提供崭新思路，统筹规划后疫情时代两国各领域合作，为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参与到公共外交格局中提供可能。其次，中国作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马来西亚外贸复苏重要动力，建议继续优化贸易结构推进东海岸铁路、“两国双园”、阿里巴巴数字自贸区等既有合作，抓住中国经济恢复与“双循环”发展机遇，在绿色发展、5G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开辟新的合作增长点，使数字经济跨境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复苏新引擎。再次，在公共卫生领域以卫生外交作为切入点续推抗疫合作，理应坚持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探讨升级新冠疫苗和新冠特效药临床试验、生产、研发等全链条合作，提升公共卫生合作水平和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共同打造中华养生的文化名片，深化中医药领域产业合作发展，发挥中医养生应对全球健康问题的独特价值，将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纳入到“健康丝绸之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最后，“经济落地文化先行”，人文交流在推动中马关系中无论是高层互访还是民间交流，在巩固传统友谊方面都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访问清华大学时发表题为“亚洲世纪：和平的基石，繁荣的纽带”的演讲时强调文明互鉴与经济互利共赢同等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应继续有序落实双边人员往来新路径，加强在媒体、智库、教育、科技、体育、旅游交流成为疫后人文合作亮点。

（二）媒体外交：重构数字化公共外交新趋势

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亟待改进，通过新媒体技术构建全媒体国际传播阵营以阐释和传播中国发展观、文明观、人权观以及全球治理观，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从新技术与新平台两个维度重构了公共外交的主体、内容与传播方式，“政府与非政府人员和组织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大数据与算法实施和参与的外交活动”³¹，“数字化公共外交”应运而生，必将成为未来中马两国媒体外交的重要形式。一方面新技术赋能数字化公共外交传播，5G时代的媒体数字化催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全媒体模式，中马区域性媒体合作组织通过建立融媒实验室，优化云采集、云编辑、云管理等数字技术在国际传播领域应用。推动科技创新、智库研究、媒体融合的相互配合，进一步加强新媒体技术人才培养，使更多跨文化、跨语言、跨媒介的综合性人才在中马传媒生态体系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平台之于数字化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体现在宏大政治叙事背景下主流媒体的话语构建容易被抵触，而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公民新闻则借船出海另辟蹊径，将触角延伸至传统主流媒体无法触及的领域，成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全新尝试。新媒体公共外交应把梳web 3.0时代社交网络传播链条，发挥社交媒体平台意见领袖网红达人的角色功用，用汇通中马的叙事话语生成更易接受的共同体内容，实现文化传播的在地化。为社交用户提供可积极参与表达的公共空间，加强民众间的双向交流，及时关注民意反馈。国际传播化被动为主动，借船出海不忘造船出海强化大外宣格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平台矩阵，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与此同时作为国家传播战略的主体，一线使领馆工作人员、跨国中资企业对外宣传人员应就如何做好公共外交工作，如何实现公共外交传播的多样化与精准化，如何提升信息发布舆情应对能力，如何与当地媒体展开合作进行分众传播，如何提升话语叙事能力塑造矫正国家形象进行思考，把握当地媒体舆论风向，由“他塑”转为“自塑”。值得强调的是，数字公共外交使对外传播更具人性化的同时，也要

31 郭毅：《数字化公共外交：实践困境、理论缺陷与伦理风险》，《未来传播》，2021年第5期，第40页。

关注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³²。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应充分借鉴非英语国家媒体的海外传播经验，学习掌握国际传播规律，在平等互信包容尊重的话语基础上，用准确、生动、富有亲和力的语言将中国声音本土化表达，突破既有瓶颈做好中国故事的阐释和推广展现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才能让双方民众看到两国合作所能带来的“共同体获得感”。

（三）人文外交：重建共性公共文化新产品

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在对外传播中往往陷入误区，将过多精力集中在对外交政策和价值观念的解读上，或是停留在传统文化形象符号的输出。如果输出文化形象符号与目标国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遑论影响他人的精神世界。实践证明作为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公共外交在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前提是重视和强调受众对象的差异性。第一，文化的接近性使华人族群在文化背景、价值观体系、宗教信仰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迁居南下的马来西亚华人将中华文化带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并与在地文化融汇传承，书法、绘画、剪纸、绣球、武术、相声、醒狮等文化技艺的传承发展折射出华人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不懈努力。时隔三年因疫情延期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以“天工开物，文化古今”为主题正式回归。第二，两国政府应共同努力推陈出新，助推公共外交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中马公共外交从“主体性、针对性和参与性”转变思路探索官民并举的交流形式，尽可能避免宏大政治叙事，积极寻找共性文化特征，避免不同文明相遇时可能产生的“文明冲突”造成“文化休克”³³。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马人文外交合作的生动例证。中马应携手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打造共性文化产品及爆款IP，从草根群体深挖文化传播的分众表达，有助于其他族裔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加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的对话，推进回儒文明和谐共生。中国驻马大使馆连续数年举办斋月捐赠活动为马来社区捐赠物资包，印证中华文化所倡导仁爱

32 赵鸿燕、李金慧：《伦理对道德的超越：新媒体公共外交的伦理探讨》，《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冬季刊，第77页。

33 袁靖华：《建设共同体话语：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的思维与路径》，《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第59页。

助人与伊斯兰文化中团结互助的斋月传统不谋而合，为中马公共外交注入活力。第三，两国通过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在旅游、教育、体育等人文领域继续加强交流，借助文化艺术传递能量凝聚人心，成为文化包容与文明互鉴的伙伴。中国驻马前任大使白天通过在线方式为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直播带货”，赋予马来西亚特色产品独特的文化内涵。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云观展”迁移到线上，为华夏文化联通伊斯兰文明增添动能。最后，中国形象符号对外传播应与时俱进，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化国际化元素。国际传播中应充分发挥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在新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与经济成就的故事，使中国式理念与模式被更多人了解，是国家形象建构的应有之义。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大贡献是实现了中国文化符号系统的拓展与延伸，通过全新的流行文化元素展现新时期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马来西亚独中学生在冬奥会期间表演主题曲《一起向未来》舞蹈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以及开放包容的精神意涵。人文外交实现公共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在公共外交能力共建中思考如何提升国际传播素养，通过建立个体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意识，使海外媒体、跨国企业、学术智库、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华人华侨、留学生群体，甚至走出国门的游客等多元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对外交往格局中。

（四）侨务外交：重置海外华侨华人新角色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加强华侨、归侨、侨眷代表人士工作，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为侨服务”。海外华人的表述已不再出现在国家官方文件的论述中，再次明确中国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为华侨、归侨及侨眷。因此在强调侨务资源的文化纽带作用时也不应刻意模糊华人华侨的边界。一方面于华侨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国际友好环境。在马来西亚开展侨务公共外交要完善以“根、魂、梦”为引导的大侨务发展格局。维护侨民的正当权益，推动和谐侨社建设，着力涵养侨胞资源在对外交流中的催化剂作用，引导海外华侨支持中国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马人文交流，塑造大国侨民形象。中国政府正在追求更加积极的大侨务政策，使各类侨务活动品牌化、机制化、常态化。另一方

面于华人是以认同为桥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促进中马文化与价值的互鉴与交融。中国对马来西亚开展公共外交务必落脚到与当地华人的利益趋同点，发挥华人群体“联通彼此”的桥梁纽带作用。运用“精英效果理论”集中资源将具有影响力的华人精英作为传播对象，影响带动其他族裔了解中华文化。中国政府只有与马来西亚政府保持良性外交关系，在国家关系中保有族群政治的敏感性，根据所在国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策略，与当地华人保持适当距离使其更好融入主流社会，才能真正惠及华人群体，实现国家侨务外交与海外华人的双向奔赴，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参与到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格局中提供理论依据。

结 语

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和平发展面临挑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³⁴。中国主张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探索，贯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隔海相望的好邻居，经贸互利的好伙伴，中国与马来西亚定将在亚洲经济复苏中发挥更为深远的区域意义。中马公共外交实践证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引导公众认同，开放共享机制互利普惠开拓创新，扩大知华友华的朋友圈，“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多元语境下形塑“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民公共外交”进路的深层次探索。

参考文献

1. 陈奕平 宋敏锋：《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04期。
2. 程曼丽：《新时期的国际传播：挑战与机遇并存》，《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10期。

34 人民网：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422/c1001-32406046.html>，取用日期：2022年10月14日。

3. 高伟浓:《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民间桥梁:东南亚国家对华友好协会中的华人角色分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4.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5. 胡春艳:《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的认知——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6. 胡春燕:《“一带一路”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与中马文化交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7. 林逢春:《马来西亚华人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与制约因素》,《亚非纵横》,2014年第2期。
8. 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第1期。
9. 刘泽彭、陈奕平:《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10. 沈大伟:《中国在当代东南亚的角色》,《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
11.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12. 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13. 钟新:《新公共外交:软实力视野下的全民外交》,《现代传播》,2011年第8期。
14.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 Gullion, E: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16. Hong Liu & Guanle Li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Rising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2019.
17. Leonard, M. & Stead, C. & Smewing, C: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18. Ngeow, C. B., & Tan, C. B: Cultural Ties and States' Interest: Malaysian Chinese and China's Rise. In B. P. Wong & T. Chee-Beng (Eds.), *China's Rise and Chinese Overseas* (pp.96-116).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8.
19. Nicholas, J.C: *Public Diplomacy, Lessons from the Past*.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 2009.
20. Snow, N: *Valuing Exchange of Persons in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Routledge, 2009.